

CI来源期刊
SE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省精品期刊

世界学术影响力期刊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ISSN1002-1965

CN61-1167/G3



情报杂志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ISSN 1002-1965



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中国·西安

3

Vol. 41

2022

目 次

· 情报理论 ·

对美军推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剖析	龙 坤 徐能武	1
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情报工作战略演进的影响	李红彩 马德辉	9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	景丽娜 唐小松	18
C-59 法案对加拿大情报工作的影响	吴常青 刘蕙嘉	25
对“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分析	沈本秋 唐小松	31
海外公共安全场景下的开源情报组织与分析方法研究	白 云 李白杨 周 艳 李 纲	38
情报分析构件化研究	汪雅君 刘亦卓 臧建国 石 进	47
数据学术与情报分析新领域：“人-数交互”研究	王 奕 张 静 王正兴	55
发展面向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的金融情报学的战略思考	于 潇 张原锷 张树青	65
应急管理中的绿色金融安全情报服务研究	陈海贝 赵湘莲	72
我国金融网络安全韧性监管研究：现实困境、英国经验及制度构建	宋心然 李鹏飞 张丽迎	80
欧盟网络安全建设的新近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余建川	87
国家安全学科人才培养布局及学科构建研究	王东明	95
国家安全学下的国家安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	王 林	102

· 网络舆情 ·

美国大选涉华计算宣传的道德基础研究	相德宝 韦向洁	108
国际涉华突发事件国内外网络舆情对比分析	陈璟浩 谢献坤	114
暴恐事件舆情数据融合机制研究	鲁世宗	121
新媒体时代的对话式传播：技术赋能、产生机制及实践路径	许 鑫	128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

景丽娜¹ 唐小松²

(1.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 510632;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 广州 510420)

摘要: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继而促进基金会政治功能发挥的过程,有助于认识美国基金会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为我国处理与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梳理 DTPILLAR 项目和亚洲基金会的档案资料、相关事实材料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中情局介入亚洲基金会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为基金会提供运作的资金和资源、参与基金会项目的开展和推广 3 个方面,分析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过程。[研究结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深度参与在赋予基金会资源的同时,根本上促进了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和美国亚洲战略的实现。同时,中情局的干预也使得亚洲基金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缺位,俨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实施的“工具”。

关键词: 中央情报局; 亚洲基金会; 冷战; 隐蔽行动; 美亚关系; 美国

中图分类号: D526;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22)03-0018-07

引用格式: 景丽娜,唐小松.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J].情报杂志,2022,41(3):18-24,54.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22.03.003

Discussion on the Intervention and Influence of CIA on the Asia Foundation

Jing Lina¹ Tang Xiaosong²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2. Reg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By analyz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IA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n promoting the exertion of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foundation,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American founda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foundations, and ensure the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DTPILLAR project and the Asia Foundation, as well as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CIA intervention in the Asia Found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tervening i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oundation personnel, providing funds and resources for the foundation oper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foundation projects.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CIA's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foundation not only endows the foundation with resources but also fundamentally promotes the CIA's covert actions in Asi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S. Asia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IA also makes the independence and neutrality of the Asia foundation gradually absent, which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too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 national strategy.

Key words: CIA; the Asia Foundation; Cold War; covert operations; U.S.-Asia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0 引言

DTPILLAR 是美国为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对抗共产主义力量,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的一个项目

代号,持续周期为 1951 年至 1967 年。在 1951 年,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借助该项目中情局出资并主导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自由亚洲委员会(CFA)。经过几年的探索,该委员会发现对“自由”的过度倡导

收稿日期:2021-09-22

修回日期:2021-11-17

基金项目: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下的‘五眼联盟’转型与我国对策研究”(编号:20AGJ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景丽娜,女,1992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美国与东南亚等;唐小松,男,1966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对外战略、国际关系理论等。

让亚洲国家对其项目产生了怀疑,加之当时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遂将自由亚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亚洲基金会(TFA)。1954年,亚洲基金会将总部设在旧金山,以国际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身份“重新”出现。亚洲基金会创立于冷战时期,受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关系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密不可分,而且在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心理战、文化战开展中发挥着工具作用,使美国的权力运作和行动实施更加隐蔽化,为美国赢取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了力量支撑^[1-2]。也有研究从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开展的援助项目为例,梳理和分析亚洲基金会在美国对亚洲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帮助实现攸关美国根本利益的战略追求^[3-4]。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对美国政府部门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相对较少,且没有充分阐明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前缘,使我们难以对基金会成立的始末形成清晰的认识,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有值得深入展开的空间。

本研究正是基于各界对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门关系存在争议,以及学界对美国政府部门在亚洲基金会初创和前期发展中的角色和干预过程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而展开。研究以中情局的干预为核心,分析其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就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人员配置、资金支持和项目开展等方面的干预进行梳理,并就中情局干预的原因从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定位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证,进而阐释亚洲基金会因中情局等政府部门介入而中立性缺失的过程,最后就美国政府部门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及影响提出一些思考。

1 中央情报局干预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主要方式

亚洲基金会虽有承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中情局间接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也强调其独立组织的身份。而殊不知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资金、平台等方面的支持,是将其作为“政治战的武器”为前提的^[5]。中情局在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运作资金和资源、项目开展和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支持亚洲基金会运作的成熟和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1.1 中央情报局介入亚洲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人员配置的干涉主要体现在管理层人选的荐举,还有专业型人才的培训和储备方面。亚洲基金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管理层,基金会前几任主席大都与中情局保持着雇佣关系,如乔治·格林(George H. Greene)和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他们均与中情局联系密切。据记录,首任主席乔治·格林是一个“具有GS-15级资历的参谋人员”,他的当选得到了中情局高级官员的认可,在就职前格林虽辞去了中情局的职务,但仍接受中情局合同工的雇佣^[6]。乔治·格林的接任者是艾伦·瓦伦丁(Alan Valentine),他在任期内规范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管理,制定了委员会管理手册、运作手册等,确保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管理和运作能助力实现其政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80年代末亚洲基金会的主席人选才脱离了中情局的背景。

中情局一般会给予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分的自主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其行动才会受到中情局在亚洲地区站长的限制。当委员会的驻地代表与中情局的地区站长产生冲突时,中情局总部则会出面进行协调^[7]。1952年,美国国税局首次确认了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免税身份,为委员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红利和优势资源。中情局还利用自身的丰富资源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管理层人员走进亚洲国家,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为其顺利履职做必要且充分的准备。在驻地代表的选择方面,中情局也倾向于选择对亚洲地区有充分了解的人士。例如,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在1954-1956年间任亚洲基金会台北办公室主任,他也有在战略情报局(OSS)工作的经历。凭借专业性和规范化的管理,加之政策方面的扶持,中情局还积极地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所从事的人才教育和培训,以使基金会的发展保留在最初设定的轨道上。

自由亚洲委员会发展前期拒绝同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领导者、专家和重要人士的合作,而将海外华人,尤其是对美国态度友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作为争取对象。同时还在海外华人中间寻找能够接受情报训练的人选,以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发展和活动的储备人才。所以,由自由亚洲委员会资助的友联出版社不光支持在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落难知识分子”生存问题的解决,还投入收集和分析大陆相关的情报,而且美国政府部门也经常采用友联出版社提供的所谓“匪情资料”^[8]。自由亚洲委员会还重视对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民主思想宣传和教育。美国官方还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亚洲地区夯实民意基础,进行民主价值的推广。包括以香港为大本营,资助图书出版和组织活动影响海外华人,支持学生联合会和学生组织发展使青年学生接受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熏陶。

1.2 中央情报局为亚洲基金会的运作提供资金和资源

亚洲基金会对外宣称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董事会募捐和其他机构的资助,但实质上却是中情局等政府部门持续性资助的产物。DTPILLAR项目的相关人员在录用和知晓自由亚洲委员会是由中情局赞助成立的

组织,并会在项目运作中提供资助。这些事实前,需要签署一份情报和安全系统(I&SS)的许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不允许承认自由亚洲委员会与中情局等政府部门的资助关系。为了掩盖中情局与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关系,中情局对委员会发展资金的注入往往通过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9]。为感谢自由亚洲委员会管理层的配合和工作,中情局还为他们提供津贴和补偿,如从1951年5月起,委员会主席每年可获得3000美元的职位津贴,以此激励自由委员会主席做好本职工作,提升组织的声望和执行力^[10]。

为更隐秘地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情局还借助第三方操作和周转。在DTPILLAR项目预算中,设置了主席储备基金,规定从1957年起,每年提供30000美元,以使自由亚洲委员会应对预算限制的约束^[11]。另外,中情局还在东海岸专门成立了亚洲基金,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募集资金,解决其缺乏可信用度较高的资金来源的问题,而且亚洲基金从事的活动范畴、对募集到资金的支配均由中情局监管,以此保证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得到资金支持和保障。

中情局借助DTPILLAR项目的推进和资源,促进亚洲基金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中情局尽全力促使DTPILLAR项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追求,并在法律和合规程序的约束下,不断地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情局所追求的目标能够顺利转化为现实。之后,鉴于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之间的联系被逐渐披露公开,亚洲基金会开始承认受到了中情局的资金支持,并承诺未来不再接受来自中情局的资金。但它仍能得到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承诺会继续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在197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还曾向国会寻求帮助,提出需要310万美元的资金解决亚洲基金会的部分预算和资金短缺问题,缓解因中情局提供资金渠道的披露对基金会产生的影响^[12]。

1.3 中央情报局参与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展和推广。首先是自由世界思想的传播。罗伯特·布鲁姆坚持认为文化活动是赢取心理战的关键,提出美国应促进非共产主义文学的传播,帮助多元化的媒体扩散“自由世界”的新闻和故事片。其中对受众具有吸引力又能实现思想传播的电影,就是亚洲基金会起初的十年来投资最多的项目之一^[13]。在中情局等部门的支持下,以亚洲地区民众为受众群体,以亚洲基金会为行为主体,以电影为宣传手段,通过电影的联合创作、大型电影节的举办、电影发行活动的召开、电影讲习班的开展等强化^[14]。自由亚洲电台作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一个分支,被中情局视为远东地区行动的开始,还

坚信该电台能够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站在同一档位。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在菲律宾马尼拉、巴基斯坦达卡(今属孟加拉国)等的转播站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播,并在日本设立分支扩大广播范围。“亚洲赠书”项目在1954年开始时规模较小,接受的国家并不多,但现已成为世界赠书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中情局还参与亚洲基金会针对海外华人的图书宣传工作,使基金会通过资助成立友联出版社和亚洲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发行与美国政治文化相关的图书。

其次是美式价值观的推广与美亚关系民意基础的夯实。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初创成员本身就代表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共存,自由亚洲委员会对其他国家团体的不同政治立场不会选择性站队,但会倾尽全力支持为实现国家独立而反对暴政、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这是委员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追求的基本表态。中情局支持基金会向亚洲地区捐赠的图书内容也多涉及自由市场和自由价值的追求,通过自由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帮助亚洲国家了解美国政治文化。另外,中情局参与的亚洲基金会支持加强亚洲当地社会组织促进政治改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项目和活动等,大部分也同美国在亚洲国家的民主人权观念推广高度契合。

最后是政经领域的援助与情报信息的搜集。亚洲基金会的援助取决于亚洲国家的需求,包括提供赠款、咨询团队、用品和设备及其他物资等。如亚洲基金会甚为重视农业和农村社区的建设,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民主种子”项目,致力解决农民的发展和社区建设。在该项目开展中,亚洲基金会还与美国一亚洲男童军、女童军、妇女俱乐部、青年商会等志愿组织进行合作,加大对亚洲国家农村发展的援助。信息与情报的搜集和对外宣传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展开工作的核心之一,基金会驻亚洲国家的代表们在正常履职过程中,为中情局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例如,在1954年6月,行动办公室制定了信息传播的程序,并发布达卡政治发展和日本学生发展的报告,在自由亚洲委员会提供的情报信息的基础上,还发布了缅甸政治局势发展报告。

2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原因

亚洲基金会对外一直以私人基金会著称,称亚洲基金会是由一群富有远见的美国公民基于对亚洲浓厚的兴趣、杰出的个人成就和奉献公共服务事业的志向而成立的。但这段介绍忽视了亚洲基金会创立的深层次动力及其价值取向,尤其是官方层面的背景。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根源在于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亚

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优势。

2.1 美国调整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部署需要非官方力量的参与和配合。美国在二战后为配合其全球战略、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势,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的战略关注,并相应地调整了针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斯大林分子和中国其他分子之间的任何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出现干涉的迹象。在适当的时候,应利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15]。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强化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性,中情局是美国冷战的主要行动机构,而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正是中情局基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调整采取的积极举措。

美国的亚洲战略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其中亚洲基金会的章程就很有政治意味。章程规定,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促进和帮助亚洲国家的个人和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间接或直接地支持、协助与自由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并通过一切可用的手段传播相关信息;支持亚洲国家非共产主义者、非极权主义者实现个人和国家自由的理想等。更为直观地讲,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就是美国为了在中国和朝鲜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寻求新的方式保持和扩大私人层面与亚洲国家民众的联系与接触。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宣传从新闻署到行动协调委员会,再到中情局,都将自由思想的传播视为使命。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既要消除苏联的影响,还要支持对美友好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与进步。自由亚洲委员会作为支持独立与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使中情局等美国政府部门能很好地借助基金会的身份掩护其战略攻势,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与大部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建立了联系,并在汉语文化作品创作方面进行合作^[16]。可见亚洲基金会可发挥作用于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中,并能够为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努力实现美国的战略追求做出贡献。

2.2 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需要拓展灵活多元的渠道和平台。隐蔽行动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特殊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也是“美国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17]。对中情局而言,创立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满足其因冷战形势发展借助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秘密宣传活动的需要。根据档案记载,DTPIILAR项目于1951年2月7日获得批准,除对项目本身所作的规定外,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项目财务管理计划于1951年4月17日正式得到批准,

其实施由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负责监督和管控。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亚洲委员会是因势而创,作为非盈利、免税收的工具性组织,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发挥作用。

随着自由亚洲委员会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阶段性突破,也得到了多数亚洲国家的接受和尊重,并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战略实施创造了相对积极的环境。莱斯特·M·萨拉蒙将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两者间的关系分为两种范式“竞争范式和伙伴范式”^[18]。美国基金会也不例外,部分基金会发展成政府部门介入世界事务的工具,受国家利益和权力追求的驱使,政治道德和原则的践行这两种力量的牵引在其他国家开展援助和发展项目^[19]。具体到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虽然一直被基金会官方和美国政府掩盖或者否认,但已有的档案资料和记录能充分证明,中情局通过深度支持和干预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其在亚洲地区的隐蔽行动开展。

五十年代亚洲地区的政治环境还不容许中情局直接采取宣传和情报搜集,因为亚洲国家的民众对外部势力的介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提防。亚洲基金会本着关注亚洲地区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宗旨,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很好地掩护。况且中情局一开始对亚洲基金会的定位就是“实施心理战的工具”“开展秘密行动的工具”,中情局通过对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影响亚洲基金会的政策目标、宣传走向,鼓励亚洲基金会参与心理政治战、进行情报搜集和传递,并帮助落实中情局和国务院的行动计划^[20]。这也是中情局大力支持创立自由亚洲委员会的根本原因,而且从发展层面,中情局也极力确保能主导基金会的方向。即充分利用亚洲基金会为平台和渠道,打通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局面,以维持中情局在美国亚洲冷战中的重要地位。

2.3 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型定位的发展积累了实操经验和信任基础。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将基金会定义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自有资金,并由受托人或董事会负责运营,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活动”^[21]。因为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身份能够提供很好地掩护,才使其从事政府部门无法涉及的事务。亚洲基金会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由公众支持的、资助型的非政府组织,它在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开展项目运作,并在其中一些国家设有驻地办公室,能够为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在亚洲地区的驻地活动提供协调。

亚洲基金会理事会制定的基本行事原则包括:相信亚洲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发展符合当地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现代化需要的本土社会、政

治和经济体制。亚洲基金会以实际需求出发制定的项目计划,满足了亚洲当地的发展需求,更为亚洲基金会赢得了立身之本并夯实了民意基础。亚洲基金会通过主动地接触和融入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也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官方活动建立了信誉基础、知识基础和工作网络,这也造就了它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亚洲基金会法案》于 1983 年 11 月正式成为一项法律,标志着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相信基金会能够在促进亚洲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美国在亚洲地区长期的利益追求。亚洲基金会对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中情局选择深度参与和干预其发展的动力,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基金会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开展,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发展援助计划密切合作。例如,亚洲基金会与国际开发署合作开展亚美交流项目。在 1980 年,亚美交流项目约有 135 个受赠参与者,到 1987 年,每年大约有 800 名受赠者参与,其中大约有 300 人参加了合作伙伴计划。这些人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中层专业人士、政治领导人和内阁部长等^[22]。亚洲基金会还积极拓展与其他基金会的合作,卢斯学者项目就是其一,在 1974 年至 1988 年,亚洲基金会共为 225 名积极进取、成就导向型的(美国)学者提供了在东亚和东南亚进行专业实习的机会。这些实习经历使学者们能够与亚洲著名的机构和个人建立联系,并拓展他们的专业知识,加深对亚洲地区的了解^[23]。亚洲基金会立足于亚洲地区现状和需求,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大型基金会开展项目合作,使其地区导向的优势更加凸显,也体现了其独特的价值性所在。

3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产生的影响

中情局的战略目标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迅速打开局面的方向标,中情局的工作网络和丰富资源则是亚洲基金会能够在亚洲地区迅速扎根发芽的支撑点。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不论是对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利益和追求的实现、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还是亚洲基金会项目运作和影响力提升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3.1 捍卫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追求。冷战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使其“变成了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一场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自卫战”^[24]。为此,美国极力争取并培养反共势力,因为心理上的争夺也是冷战对峙的重要部分,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上的博弈。作为

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可以直抵对方的国家之内,又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并且很难被防御”^[25]。DT-PILLAR 项目致力于通过私人团体、私人机构的活动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愈来愈强的影响力,通过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人民凭借自身努力和民主的方式实现合法化的目标追求。亚洲基金会借助中情局等政府部门的平台和资源,促进了亚洲国家新青年领导者的培养,并强化了当地民众对自由、民主文化和理念的认知,以此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亚洲基金会所做出的反共努力促成了美国在亚洲反共战略的落地实施,并极力维护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追求。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支持和干预使得亚洲基金会发展迅速并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追求,基金会的运作采取了与美国政府多部门协调,盘活多样化资源和平台的方式。跨部门合作的模式既是亚洲基金会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也是美国政府部门实现亚洲战略追求的重要途径。像美国大多基金会的慈善事业有美国政府部门直接或者间接的介入,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支持和介入,也正是以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为基本出发点,借助亚洲基金会的渠道、平台和资源维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

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对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工作和价值也给予了肯定,认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可以做很多实质性的活动,并且这些是不能通过美国新闻总署或其他项目实现的。所以,自由亚洲委员会理应得到充分的支持和相对的决策权,不过前提是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一切活动不能与新闻总署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的活动相冲突^[26]。

3.2 实现了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隐蔽行动被称之为介于正式外交和战争之间的第三选择。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我们需要一个情报机构,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在不适合军事行动、外交无法运作的灰色地带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27]。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当了中情局施行心理战的工具,为政策协调办公室的活动提供掩护,通过项目活动在亚洲国家培养对美国友好的力量,鼓励当地与美国政策目标相向而行的政治、青年、劳工、宗教等组织的发展。而且,亚洲基金会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项目报告涵盖了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题,驻地代表也通过亲身经历就亚洲当地条件和社会环境做了深入分析。这些报告类的资料为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提供了丰富的前期资料和素材,也为其隐蔽行动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参考。

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的根本目的也被美国官方层

面定位为满足美国在远东灰色心理战的需求,使美国政府部门能够通过利用自由亚洲委员会有效开展隐蔽行动。因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是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灰色心理战的载体而存在,当然,自由亚洲委员会对隐蔽行动的参与均以经过华盛顿总部的同意和中情局的协调为前提。隐蔽行动的本质在于以秘密干涉他国事务的方式寻求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包括政治咨询与建议;对个人的资助;对政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对私人组织的支持;秘密宣传;人员的秘密训练和交流等^[28]。而这些内容在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展中均有涉及,中情局的主导和支持也使得亚洲基金会对于隐蔽行动的参与更具针对性,相应的效果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和支持,为其隐蔽行动的落实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亚洲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身份也使中情局的行动在其项目的掩护下更为深入隐蔽。1953年,法菲尔德基金会和美国驻巴黎办事处停止了对美国委员会的资助,导致美国委员会的发展和活动出现了资金缺口,在悉尼·胡克、索尔·斯坦因和诺曼·托马斯等人对中情局的游说之下,中情局通过亚洲基金会捐助了4000美元,用以支持美国委员会的进一步运作。在1966年,为帮助美国中心举办好1966年的第34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中情局调动了“全部秘密武器”,其中就包括通过亚洲基金会、自由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为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部分的经费支持^[29]。而通过亚洲基金会为秘密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既能掩盖支持资金的真实来源,又能使中情局的主导性得到充分体现。

3.3 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运作和影响力提升 中情局的支持干预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当地社会的深根细作,推动了基金会在亚洲地区项目的进展。虽然两者的互动关系呈现出相对的不平衡,亚洲基金会偏向过度依赖中情局导致了亚洲基金会独立性、中立性的弱化,但这种互动模式在根本上也促进了亚洲基金会的前期发展。以战后亚洲地区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需要内生动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为背景,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中情局的支持下致力于通过在亚洲地区活动的开展,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建立友好联系,增强自由世界人民的平等感;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共同努力,实现亚洲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合作,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实现亚洲地区民众作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代表,表达当地社会发展的诉求^[30]。亚洲地区实现发展和繁荣、自由与民主是亚洲基金会自诩的使命,中情局的深度参与和资助使得基金会为亚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并受到了部分亚洲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层面的赞誉。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功能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王梅香从权力中介者的视角出发分析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文化权力宣传中权力运作的多重性,指出基于非官方色彩和民间组织的特征,亚洲基金会在权力运作中经历了从经费赞助者,到政策辅助者,再到政策介入者的转变,中介了官方民间组织、政治与文化生产和消费,使得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权力运作达到双重隐蔽的效果^[31]。可见功能的转变和介入的深化是亚洲基金会影响力强化的关键,而且亚洲基金会在促进亚洲国家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民众对基金会的认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过十多年发展的亚洲基金会在美国国内和亚洲国家均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亚洲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及资金来源等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967年3月22日,在华莱士·特纳(Wallace Turner)为《纽约时报》专门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亚洲基金会作为独立的慈善组织接受中情局的资金支持,直面披露了中情局与亚洲基金会的内在联系^[32]。1967年7月,根据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的建议,经约翰逊总统的批准,由中情局秘密支持亚洲基金会发展的DTPILLAR项目终止。文件规定自1967年7月31日起,亚洲基金会的一切责任,包括法律、道德、负债及承付款项,均由董事会全权负责,且董事会需向中情局保证将延续现有的政策和利益领域及职能和程序^[33]。当然,DTPILLAR项目的终止并没有宣告亚洲基金会的解散,该项目的结束也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参与,因为中情局依然可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亚洲基金会。另外,DTPILLAR项目在运营期间搭建的工作网络、合作平台、互动机制等也能保障亚洲基金会继续履行它的使命,并发挥其政治功能。通过与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募集资金和拓展渠道,促进亚洲地区政府治理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合作开展等。

4 结 语

从中情局为亚洲基金会所提供的支持和对基金会发展的深度参与可见中情局在基金会的创立、前期发展以及影响力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亚洲基金会也付出了相应的“回馈”,促进了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情报信息的搜集等,而且双方的依赖与合作关系在基金会前期发展阶段成效显著。从历史的发展和现阶段的进展可见,亚洲基金会凭借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在亚洲国家所进行的项目和活动,有助于实现美国政府部门无法直接参与其中,但又攸关美国

在亚洲战略利益的事务。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影响力的延伸,为美国基金会对外项目和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美国基金会的对外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慈善、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加之美国基金会与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在对外项目合作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积累,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互通机制相对更加成熟,使得基金会对美国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等的参与程度更深。将亚洲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其项目和活动与美国亚洲战略实施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亚洲基金会借助身份的隐蔽化、运作的当地化、项目的多元化和影响的持久性等优势,在亚洲国家进行美式价值观的传播、民主政治改革的实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亚洲战略的落地实施。探讨亚洲基金会在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实施中的功能发挥,能够充实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研究,认识多元主体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未来期望能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以上议题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实现以点带面地认识美国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和影响,包括在中国的运作情况,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与外国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在创造合作基础和提供便利的同时,对基金会隐藏的深层政治动机和目标保持高度警惕,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

参 考 文 献

- [1] Blum R.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J]. Pacific Affairs, 1956, 29(1): 46-56.
- [2] 翟 韬. “文学冷战”: 大陆赴港“流亡者”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反共宣传[J]. 世界历史, 2016(5): 67-81.
- [3] 许 卓. 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J]. 国际政治研究, 2020, 41(1): 116-133.
- [4] Lee S. The Asia Foundation's motion-picture project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Asia [J]. Film History, 2017, 29(2): 108-137.
- [5] Emma B. The Asia Foundation's public distancing of its relation with the CIA didn't end agency's ties [EB/OL]. [2021-07-30]. <https://www.muckrock.com/news/archives/2017/nov/03/taf-2/>.
- [6] Memorandum for ADPC: Salary and allowances: President, 17 April, 1951, DTPILLAR VOL.1_0096 [EB/OL]. [2021-01-15]. https://ia8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96.pdf.
- [7]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n coordination of DTPILLAR activities with FE covert missions, 17 October, 1951, DTPILLAR VOL.1-0035 [EB/OL]. [2020-12-22]. https://ia8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35.pdf.
- [8] 古远清. 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32.
- [9] Memorandum for assistant director for policy coordination: Recommended financial plan for OPC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1 March, 1951, DTPILLAR VOL.1_0097 [EB/OL]. [2021-01-15]. https://ia6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97.pdf.
- [10] Supplemental letter of instruction, 10 May, 1951, DTPILLAR VOL.1_0060 [EB/OL]. [2020-12-22]. https://ia6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60.pdf.
- [11] Memorandum for deputy director (plans) special support assistant to the DD/S: Amendment No.2 to revised administrative plan for IO division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13 August, 1958, DTPILLAR VOL.2_0004 [EB/OL]. [2021-06-10]. https://ia8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2_0004.pdf.
- [12] CIA operations center: News analysis service, CIA FOIA, 11 May, 1976, CIA-RDP88-01315R000100420001-0. CIA [EB/OL]. [2020-12-20].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8-01315R000100420001-0.pdf>.
- [13] Lee S. On John Miller's "the Korean film industry": The Asia Foundation, KMPCA, and Korean cinema, 1956 [J].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Korean Cinema, 2015, 7(2): 95-112.
- [14] 张选中. 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 [15] NSC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 S. with respect to Asia [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0 December, 1949.
- [16] Shen S.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J]. American Quarterly, 2017, 69(3): 589-610.
- [17] 刘丽云, 张惟英, 李庆四.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54-355.
- [18] 莱斯特·M·萨拉蒙. 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M]. 田 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15.
- [19] 塞缪尔·亨廷顿. 失衡的承诺 [M]. 周 端,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246.
- [20] Emma B. The stolen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Asian Foundation [EB/OL]. [2021-04-20]. <https://www.muckrock.com/news/archives/2017/nov/02/taf-1/>.
- [21] Andrews F 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56: 11.
- [22] Annual 1987 Report: The Asia Foundation [R]. San Francisco, Calif: The Foundation, 1987: 82.
- [23] Annual 1993 Report: The Asia Foundation [R]. San Francisco, Calif: The Foundation, 1993: 99.
- [24] 哈里·罗西兹克.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 [M]. 奋然, 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4: 12.
- [25] 贝恩德·施特弗尔. 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M]. 孟钟捷,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244.
- [26]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28 December, 1951, DTPILLAR VOL.1_0084 [EB/OL]. [2021-01-15]. https://ia6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84.pdf.

(下转第 54 页)

使用 Iware 方法实现知识网络,进而进行情报分析,例如关联用户聚类或发现意见领袖。在这种自底向上的情报分析中,与自顶向下模式的一个区别在于,此种方法中人工参与的流程较多,在从原始数据到高级知识的输出过程中需要情报分析人员的参与,以确定下一步需要的流程与 Iware,直到获取最终结论。

4 结 语

情报分析构件化实际上是对情报分析的对象、手段、分析结果进行的构件化处理,能够辅助情报分析人员和不涉及系统细节的领域情报专家进行智能情报分析,较为灵活、简便地实现逻辑流程完整的情报分析系统,减小人力开销与时间成本,缩短了从数据到情报分析人员以及不同专家之间的知识距离,有利于加速情报知识转移,提高由原始数据转变为可供分析知识的过程效率。本文针对当前情报学领域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通过可行性分析,提出了情报分析构件化这一概念;同时给出情报分析构件化的基本组件与模型,详细描述了情报构件的标准化,包括构件设计原则、构件间数据传输及构件组合。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完善情报分析构件化体系,对构件模型的层次结构、逻辑接口和数据传输规则进行系统化完善,推动情报分析构件化的实际应用。

参 考 文 献

[1] 李国秋,吕 斌.预测市场——一种情报分析研究的新方法[J].情报杂志,2014,33(1):11-15.
 [2] 岳增慧,许海云,郭 婷,等.“情报学”与“计算机跨学科应用”的学科交叉对比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6(2):16-22.
 [3] 马费成,张 瑞,李志元.大数据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J].图书情报知识,2018(5):4-9.
 [4] 甘 翼,王良刚,黄金元,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情报分析和探索[J].电讯技术,2018,58(5):506-513.
 [5] 曾建勋,魏 来.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情报学报,2015,34(1):37-44.
 [6] 王知津.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变”与“不变”[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7):1-10.
 [7] 张庆普,陈 茫.Web 4.0 时代的情报学创新探究[J].情报学报,2016,35(10):1048-1061.
 [8] 时艳琴,陈雪飞,谢 威,等.情报 3.0 时代情报的特征、任务与工具[J].情报杂志,2017,36(10):1-6.
 [9] 张 莉,和金生.知识距离与组织内知识转移效率[J].现代管理科学,2009(3):43-44.
 [10] Liyanage S, Barnard R. Valuing of firms' prior knowledge: A measure of knowledge distance [J].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2003, 10(2): 85-98.
 [11] Qian Y, Liang J, Dang C. Knowledge structure, knowledge granulation and knowledge distance in a knowledge bas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 2009, 50(1): 174-188.
 [12] Capaldo A, Lavie D, Messeni Petruzzelli A. Knowledge maturity and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innovations: The roles of knowledge distance and adop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3(2): 503-533.
 [13] Turner S F, Bettis R A, Burton R M. Exploring depth versus breadth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J]. Computational &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2002, 8(1): 49-73.
 [14] 王映辉.软件构件与体系结构 原理、方法与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5] 康炳峰.基于构件的可重用软件开发方法研究[J].计算机与网络,2007(21):44-46.
 [16] 钟林辉,侯长源,宗洪雁,等.构件化软件演化信息及演化相似性度量技术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5,32(5):1399-1402,1416.
 [17] 孙亚男,聂彤彤,徐 峰.构件化项目管理体系应用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2(2):107-109.
 [18] 钟林辉,宗洪雁.基于本体的构件化软件演化信息获取及度量研究[J].计算机科学,2015,42(1):196-200,231.
 [19] 周锦程,王 丹,余 泉,等.基于领域工程的构件化可扩展管理信息系统[J].计算机系统应用,2010,19(12):34-38.
 [20] 关佳红,申浩蕪.软件重用技术与 GIS 软件开发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5):719-722.
 [21] 王忠杰,徐晓飞,战德臣.基于特征的构件模型及其规范化设计过程[J].软件学报,2006(1):39-47.

(责编/校对:贺小利)

(上接第 24 页)

[27] Johnson L K. America's secret power: The C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28] Marchetti V, Marks J D.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300.
 [29]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M].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258-259, A15.
 [30]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1 March, 1951, DTPILLAR VOL.1_0008 [EB/OL]. [2020-12-22]. https://ia6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VOL.%201_0008.pdf.
 [31] 王梅香.冷战时期非政府组织的中介与介入:自由亚洲协会、

亚洲基金会的东南亚文化宣传(1951-1959) [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9(1):123-158.
 [32] Turner W. Asia Foundation got C.I.A. funds: Trustees deny influence-bar future hidden aid [N]. New York Times, 1967-03-22 (17).
 [33]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Liquidation of CA staff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6 June, 1967, DTPILLAR VOL.3_0006 [EB/OL]. [2021-03-10]. https://ia600207.us.archive.org/20/items/DTPILLAR/DTPILLAR%20%20VOL.%203_0006.pdf.

(责编/校对:王育英)



《情报杂志》征稿

《情报杂志》(月刊)是由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主办的我国情报学领域的学术性期刊,是CSSCI来源期刊(南京大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清华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RCCSE核心期刊(武汉大学)、《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陕西省精品期刊。

本刊以情报研究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为宗旨,积极推动中国情报学界的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体系;以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和国家安全情报实践为特色,重点关注:国家情报、国家安全情报、科技情报、竞争情报;舆情研究、智库研究、技术预见、网络/信息安全;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数据分析与管理、科学计量学等研究方向。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投稿。

投稿时请务必通过本刊网站(<http://www.qbzz.org/>)在线投稿,不接收邮件投稿。稿件格式务必按本刊网站“投稿须知”的要求撰写。

本刊对拟录用稿件,先于纸刊实现“CNKI网络首发”,每篇网络首发论文均可下载“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首发论文出版证书”(等同于论文的纸质出版证明)。

通讯地址:西安市雁塔路南段99号《情报杂志》编辑部

邮编:710054

联系电话:(029)85529749

<http://www.qbzz.org/>

2022年增刊征稿通知

尊敬的作者:

为了满足广大作者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编辑部决定在2022年6月出版增刊一期,要求如下:

1. 所投论文研究方向同《情报杂志》正刊,不得超出其范围。
2. 论文一律通过本刊在线系统投稿(<http://www.qbzz.org/>)。
3. 投稿前须认真阅读本刊“投稿须知”,严格按“投稿须知”中的相关要求撰写。

《情报杂志》编辑部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17 定价:28.00元